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CC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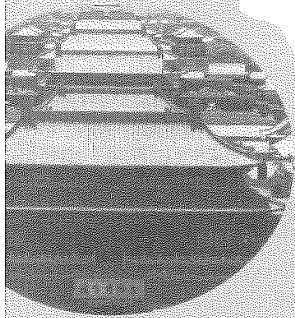
# 中國大陸概論

增訂二版

王信賢、寇健文|主編

王信賢、寇健文、鍾延麟、蔡文軒、王嘉州、張弘遠、  
林雅鈴、劉致賢、曾偉峯、王韻、王占璽、王毓莉、  
黃瓊萩、呂冠頤、張登及、沈明室、郭瑞華|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大陸概論 / 王信賢, 寇健文, 鍾延麟, 蔡文軒, 王嘉州, 張弘遠, 林雅鈴, 劉致賢, 曾偉, 王韻, 王占璽, 王毓莉, 黃瓊萩, 呂冠頤, 張登及, 沈明室, 郭瑞華著; 王信賢, 寇健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1.09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077-3 (平裝)

1. 中國大陸研究 2. 中華人民共和國

628.7

110013031



1PSB

## 中國大陸概論

主 編 — 王信賢 (5.9)、寇健文

作 者 — 王信賢、寇健文、鍾延麟、蔡文軒、王嘉州  
張弘遠、林雅鈴、劉致賢、曾偉峯、王韻  
王占璽、王毓莉、黃瓊萩、呂冠頤、張登及  
沈明室、郭瑞華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經理 — 楊士清

總編輯 — 楊秀麗

副總編輯 — 劉靜芬

責任編輯 — 林佳瑩、吳肇恩

封面設計 — 姚孝慈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 (02)2705-5066 傳 真: (02)2706-6100

網 址: <https://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mailto: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 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20年9月初版一刷

2021年9月二版一刷

2023年3月二版三刷

定 價 新臺幣520元

# 中國黨國體制與菁英政治

寇健文

## 壹、黨國體制的運作：「黨的領導」與全面控制政治事務

### 一、黨的領導

中共政權是典型的黨國體制，黨是整個政治體系運行的核心。黨和政府交織在一起，同時黨的地位高於政府。無論是國家施政方針或重要官員任免，都先經過黨做出決定。1978年改革開放前，國家透過計畫經濟體制，強力穿透社會，國家與社會的界線消失。1978年以後，市場經濟改革降低國家對經濟事務與社會活動的全面控制，但黨國體制並未發生根本性鬆動，國家干預市場與社會的程度仍高於一般威權政權。因此，中共政權可以被歸類成「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

### 後極權主義

後極權主義是界於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的一種特殊政權形態。這種政權通常是由極權主義退化而成，一般威權政權不容易直接轉化成後極權主義。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在《*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一書中，從多元化（pluralism）、意識形態（ideology）、動員（mobilization）、領導（leadership）等四個面向比較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的異同。他們認為後極權主義控制政治過程與社會的程度高於威權主義，如維持一黨制、控制軍警、媒體與社會組織。另一方面來說，後極權主義在社會經濟面向的多元化程度高於極權主義，如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社會利益分殊化。

在黨國體制的運作中，中共強調「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在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中，最核心的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依據中共黨章的界定，「黨的領導」包括政治領導、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

政治領導，就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則、重大決策的領導，是指黨決定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的政治路線調整後，政府施政方向也就會跟著調整。

思想領導則是理論觀點、思想方法、精神狀態的領導……。有了正確的思想領導，才能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中共通過政治教育與宣傳，使黨員和人民接受官方意識形態，認識和解決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種問題。

組織領導是指幹部的選拔和任用的領導，表現為黨的幹部執掌國家各級政權機關的重要領導崗位。沒有強而有力的組織領導，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就會落空。……（謝慶奎主編，1991：103-106）。

在政治領導方面，中共決定全國全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舉例來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黨的路線，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華國鋒的主張）轉移到「經濟建設」（鄧小平的主張），就是典型的政治路線的調整。

思想領導強調黨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權。以華國鋒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說，其思想領導就是「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主張。鄧小平提出的「經濟建設」，其配套的思想領導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再如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上任後逐漸形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下簡稱：習思想），都是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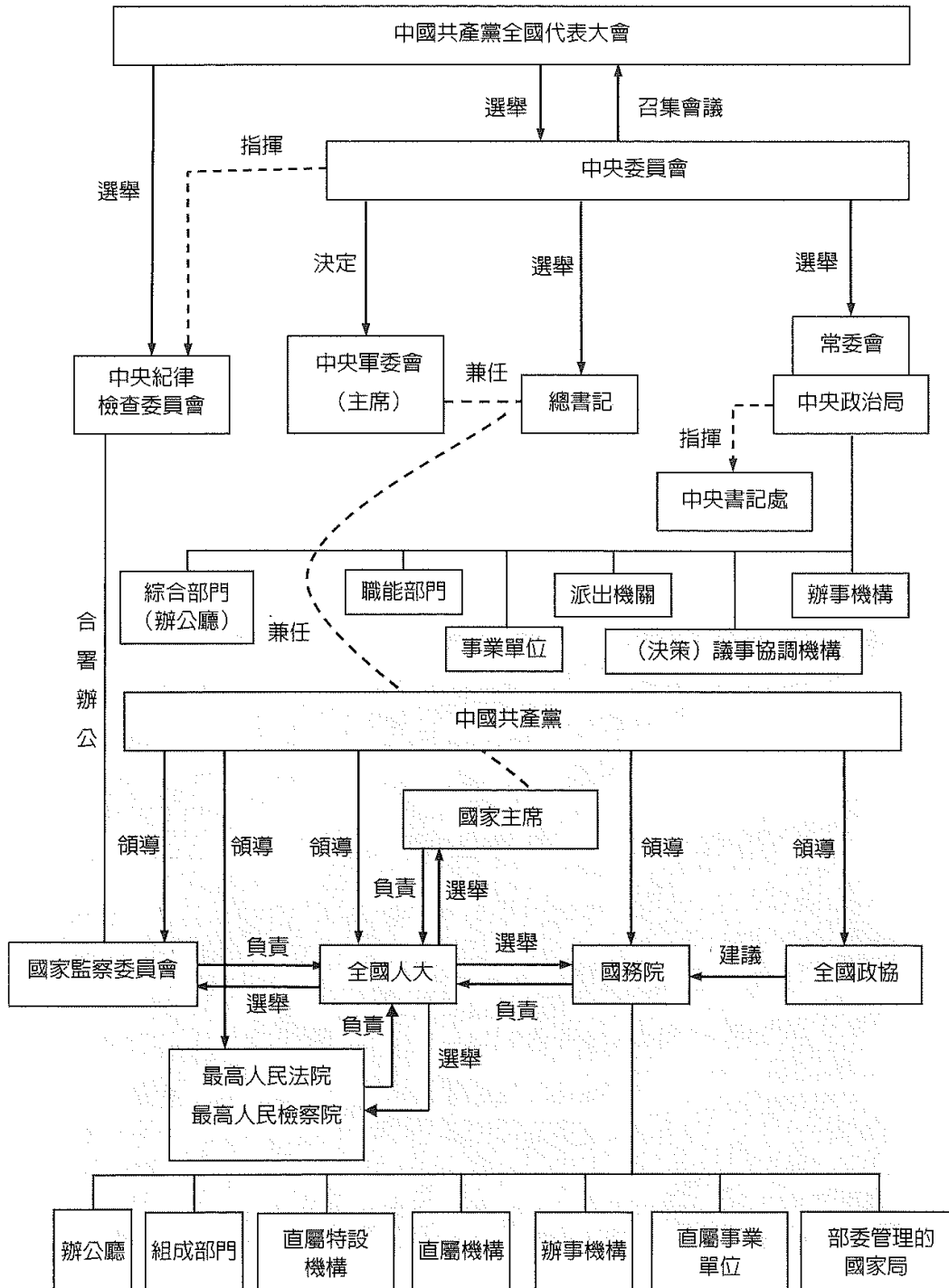
「思想領導」上的體現。

在組織領導方面，中共制定幹部選拔標準與決定重要人事任命，即「黨管幹部」。例如1964年毛澤東爲了防止中共內部出現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的修正路線，提出要培養革命接班人的五大條件。華國鋒提出的組織領導，則依循這五項原則。1980年代初期，爲了有效推動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與專業化的「幹部四化」原則，並寫入1982年十二大黨章。「黨管幹部」維持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與領導人的政治權威，是中共實現一元化領導的重要支柱。黨的領導機構和組織部門擁有人事任免與考察權，透過黨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稱表」（Nomenklatura），分級管理和任用黨政幹部。習近平上任後，特別突顯「黨的領導」原則的重要性。

照片3-1 宣傳標語「黨在我心中 永遠跟黨走」



圖3-1 中共中央黨政軍結構圖



註：已新增2018年3月設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

資料來源：寇健文、蔡文軒（2012：25）。

## 二、中共的組織結構

在黨國體制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是整個黨機器的核心，中央書記處則輔助前兩個機構的運作，總書記則是最高領導人。依據中共黨章，黨內最高權力機關就是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全國黨代會）。全國黨代會每五年舉行一次，選出中央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委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紀委）。因開會頻率不高，全國黨代會並無實質決策權。下級黨代會選出全國黨代會代表，全國黨代會選出中委會，中委會選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總書記。此外，中委會根據政治局常委會的提名，通過中央書記處成員，並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會）組成人員。

全國黨代會閉會期間，中委會負責執行全國黨代會的決議，對內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委會全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在中委會閉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行使中委會的職權。黨內真正的最高決策中心是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由總書記主持這兩個機構的會議。其他黨務、國務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政協）和其他重要機構的領導人都是它們的成員。

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下設中央書記處，作為日常的辦事機構，承命推動工作。總書記召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並且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中紀委專司黨員風紀與廉能工作，與2018年3月設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監委）合署辦公，為「一個機構，兩塊招牌」。黨內另設有中央政法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政法委），指導協調法院、檢察院、公安、國安、司法行政部門工作。黨的軍委會是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因此中國大陸並沒有軍隊國家化的制度設計。除黨的軍委會之外，另有根據《憲法》設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兩個軍委會「一個機構，兩塊招牌」，一般用法上不刻意區分這兩個軍委會。中共中央設有辦公廳、職能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辦事機構

（如政策研究室、臺灣事務辦公室等）、派出機構（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與直屬事業單位（如中共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等等）。此外，中共中央設置許多領導小組（委員會）或協調小組，專司特定領域事務。各小組由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擔任組長和副組長，多個業務相關的黨政軍部門首長擔任小組成員，以集中政治資源，統一協調和領導跨部門、跨系統或跨區域的行動。這些議事協調機構，負責政策匯集與監督執行，是重要決策機制。

中共地方組織大體上是複製中央組織。各級地方組織以黨代表大會為（形式上的）權力機關，負責選舉同級委員會和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黨委會在同級黨代會閉會期間負責領導黨的工作。基層黨組織則視工作需要和黨員人數，經上級黨委批准後設立基層黨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委員會，同樣經由選舉產生書記和副書記。各級黨委工作部門接受同級地方黨委領導之外，還接受上級工作部門的領導，形成「雙重領導」。

黨組是中共領導各類組織部門的主要機制。中共在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部委辦局，以及各類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設置黨組，唯國監委內不設置黨組。各級地方政權機構與組織團體也一樣設有黨組。黨組受同級黨委領導，對黨委負責。部門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黨組負責向同級黨委報告，並負責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黨委的決定貫徹到本部門的工作（王林生，2005：78-79）。黨組是實際權力機構，有權討論和決定本部門中的重大事務；黨組的成員，由批准成立黨組的上級黨委指定，黨組設書記和副書記；黨組的領導，則由該部門的黨籍負責人兼任（俞可平，2001：19-20）。2015年6月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設置黨組的覆蓋面更廣泛。

### 三、中共對民主黨派與社會團體的控制

中國大陸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一方面



中共的領導和執政地位不變，另一方面八個「民主黨派」以參政黨身分參與政府運作、提供政策意見。中共是執政黨，依法執政；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依法參政，沒有政黨輪替、政黨競爭的情況。因此，在西方政治學的歸類中，中國大陸的政黨制度屬於一黨制。中共對其他民主黨派實行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中共的基本理論、路線、綱領、經驗得到各民主黨派認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爲各政黨的共同目標。

在改革開放以前，所有社會組織都被中共控制。無論是在人事任免、經費預算上，均受到國家控制，比較類似官方政策的傳送帶。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使得國家喪失部分控制社會的手段與資源，如工作分配、糧食物品配給等，導致當今的社會要比過去多元化、分殊化，但國家仍將所有重要、大型的社會組織收編到黨國的權力脈絡中。對國家而言，社會組織可能成爲集體行動的載體，也可能提供公共財。康曉光、韓恆（2005：73-89）以「分類控制」來概括中共管理社會組織的特徵。如工會組織具有較強的潛在挑戰能力，一直由黨國自上而下組建，將其視爲「準政府組織」。宗教組織可能在價值領域建立不同體系，因此以「三自教會」系統限制其自主性。協會、商會和官辦NGO的潛在挑戰能力較弱，但能提供重要公共物品，國家自然是鼓勵和支持。政治反對組織則是嚴厲禁止和取締。

## 貳、習近平集權與重塑後的黨國體制

### 一、最高領導人個人集權

習近平時代中共政治的最大特徵是權力集中，權力既集中於最高領導人身上，也集中在黨委機構（即「黨政合一」），改變鄧小平時代以來走向集體領導與黨政分權的趨勢。1980年代鄧小平等革命元老反省毛澤東時代的權力過分集中現象，造成個人專斷的弊端、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的問題，同時基於與華國鋒鬥爭的政治需要，倡導集體領導、黨政分開、個人

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以改善黨內領導體制與政治生活的弊端。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調「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務的部署、幹部的重要任免調動等重要議題都需要集體討論決定，不得個人專斷。開會時書記是「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書記或第一書記要善於集中大家的意見，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共產黨員網，2015）。1980年8月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中共政治體制中存在著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特權現象等等問題。這次談話後來被定名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剖析中共領導體制弊端的重要文件，也是領導制度改革的指導綱領。鄧小平等元老不希望再度出現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成為「權力分享」機制發展的源頭。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權力分享」機制陸續形成，如劃線離退、刑不上政治局常委、隔代指定、梯隊接班、逐級晉升、集體領導等。同時，由於總書記與主要政治局常委（特別是總理）之間的地位相對較為平等，各自仕途發展相對獨立，因此形成多頭馬車的權力格局。在這種權力格局下，集體領導的決策體制逐漸制度化。然而，在胡錦濤時代，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間過於平等的權力關係導致「九龍治水」、「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端（Asianews.it, 2007；阿波羅新聞網，2014；多維新聞網，2019）。換言之，制度化有助於重大政策的穩定性，但也制約重大改革的推行，造成決策中樞無法即時回應環境需要。

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後，中共黨國體制一反過去趨勢，走向個人集權。集權包含兩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最高領導人權力擴大。習近平在體制上改變總書記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間只是「同僚之首」（first among equals）的關係，而是長官與部屬的關係。中共中央新設多個領導小組，諸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與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等，被外界形容成「小組（委員會）治國」。這些新設的小組與原有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

作領導小組、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等皆由習近平親任組長（主席、主任），弱化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決策模式。2015年起進行的軍事改革中，解放軍四大總部被重組為15個軍委直屬部門，強化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制度基礎。2016年10月，中共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確認習近平的「領導核心」地位，使其成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之後，中共第四位核心領導人。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思想）寫入黨章，習近平的理念成為全黨貫徹執行的目標。習近平掌握了意識形態的最高詮釋權，他的話語就是政策執行的標準、行動的綱要。習近平人馬也掌控黨國體制中的許多關鍵職務，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中握有多數席次。2017年10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要求全體政治局委員每年都要向黨中央和總書記習近平書面述職。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 二、黨委擴權

照片3-2 街頭販售的毛澤東及習近平像



資料來源：美國之音（2018）。

基於文革時代出現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鄧小平強調黨政分開、政企分離。1980年8月鄧小平（1994：321，339-340）表示，「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於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今後凡屬於政府職權範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討論、決定和發布文件，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發指示、作決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在對國家事務和各項經濟、文化、社會工作的領導中，必須正確處理黨同其他組織的關係，從各方面保證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職權……」（張文正、馮秋婷主編，1990：141）」由此可見，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的目的是區分黨和政府的職能，用以解決毛澤東時代黨委權力過分集中，導致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這種做法是機構之間的職能分開，具有「權力分享」的意涵。1982年十二大黨章修改、1982年憲法、1987年十三大政治報告都持續強調「黨政分開」與「行政首長負責制」。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不再強調「黨政分開」。原本配合「黨政分開」理念而不在國務院各部門設置黨組的做法也被取消（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1992年十四大政治報告中，政治體制改革偏向「行政改革」，不再提到十三大政治報告中的增加中委會開會次數、工作報告制度、黨政分開等政改議題。「黨政分開」甚至認為是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干擾與破壞」，削弱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張天榮主編，1991：92）。儘管如此，黨委和政府的職能仍有所不同。1980年代以後，朱鎔基、溫家寶都是在經濟社會事務上有實權的總理，也代表國務院在相關領域的決策重要性。

習近平執政期間，中共黨國體制朝著黨委擴權的方向發展。黨委擴權的第一個跡象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小組（委員會）治國」。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進一步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加強中共中央對重

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除了新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之外，原先的深改、網信、財經、外事等多個領導小組提升為「委員會」。新組建的委員會更加強調黨中央的決策作用，建立黨中央全面領導體制。

第二個跡象是重點反覆強調黨的領導地位。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共產黨員網，2017）。中共十九大通過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時，該政治原則被寫入黨章。2018年3月兩會之際，中共將前述黨章的論述寫入《憲法》，中共的執政地位融合到憲法秩序中，並宣示政治路線將持續以「習近平思想」作為方針，服膺於黨的領導。原先中共僅在《憲法》序言中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但並沒有黨的領導的相關論述，顯見在習近平時代，更加強調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第三個跡象是在2018年3月的機構改革方案中，因要「落實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黨委的職權明顯增加，甚至出現以黨代政或黨政合一的情況（BBC News中文網，2018）。為了確保黨對新成立之國監委的控制，國監委和中紀委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實行「一個機構，兩塊招牌」。由於黨國體制中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習近平以強化內部監督來強化監督幹部的目標。中紀委職能強化後，再和國監委合署辦公，使得黨的監督機構得以運用國家機關的名義，監督非中共黨籍的幹部。國務院部分涉及人事、意識形態和統戰領域的機構也被整併至黨中央職能部門。如中共中央組織部統一管理公務員工作，對外保留國家公務員局牌子，國務院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公務員局。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揭示著習近平時期中共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改造藍圖。該《決定》開頭寫道，中國大陸當前面對的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且複雜。

習近平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的策略，是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達成現代化的做法則是權力集中。權力集中的趨勢已經或未來將展現在黨政關係、國家社會關係與國家市場關係之上。

## 參、改革開放後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

### 一、鄧小平時期（197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

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特約評論員文章，挑戰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最後獲得勝利。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82年2月，中共通過《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中央與省級黨政司法機關主要負責幹部「正職一般不超過65歲，副職一般不超過60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1987：414）。但該《決定》替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元老開了一個後門，不受限制。由於未將黨和國家領導人納入限齡退休的範圍，導致1980年代後期出現老人政治。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修改黨章，明定「幹部四化」政策。同時，成立中央與省級的顧問委員會，作為安置離休老幹部的單位。新黨章突顯「黨政分開」，規定「黨的領導」內涵，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杜絕黨委以黨的名義發布法律性文件，並強調各級黨委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十二大選出胡耀邦為總書記，華國鋒被迫退出政壇，掃除文革派殘存力量復辟的希望。

#### 幹部四化

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即在幹部任用標準上，強調支持鄧小平改革路線（或跟中央保持一致）、年齡較輕、具大專以上學歷（以後提高至大學本科以上）、具有專業知識。

1987年1月，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臺，由趙紫陽接任總書記。1987年10月，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詳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還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構想。改革重點包括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將國家公務員分為政務和業務兩類，強調「黨政分開」與「行政首長負責制」，並引入「差額選舉」。十三大調整中央領導班子，趙紫陽當選總書記，鄧小平、陳雲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但分別擔任軍委主席和中顧委主任。此外，十三屆一中全會做出祕密決定，鄧小平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常委遇到重大問題仍要向他請示。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初階論）

1987年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即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紀中葉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的整個歷史階段。」中共以此作為全黨工作轉向經濟建設的理論基礎。

### 差額選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制度中，差額選舉與同額選舉並存。差額選舉是指候選人數多於應選人數的選舉，差額比例不一，視職務性質而定。如中共省委書記是同額選舉，省委常委實施差額選舉，但差額只有一人，省委委員差額約為當選名額的5%。差額選舉有兩種方式進行：一為正式選舉中候選人數多於應選人數；二為在正式選舉前辦理預選，預選時採用差額選舉，產生候選人名單，然後進行同額的正式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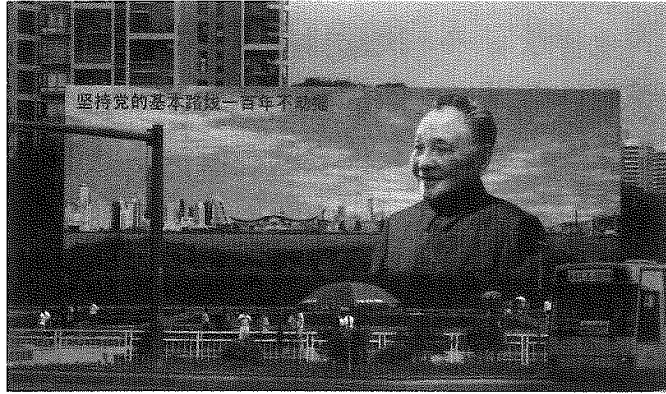
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引發六四事件。在同年6月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趙紫陽遭到罷黜，江澤民當選為總書記。至此，鄧小平先後失去胡耀邦、趙紫陽兩大助手，接班安排徹底失敗。同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由江澤民接任。楊尚昆、楊白冰分別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軍委秘書長，代表鄧小平控制軍隊。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陳雲等保守派掌握經濟與宣傳大權，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受阻。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抨擊保守派觀點，成功解決黨內姓社姓資的爭辯，並掌握十四大籌備工作的主動權，預先部署他身後的路線與人事。首先，鄧小平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將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路線等字眼，寫進十四大黨章。不過，在十四大報告中，政治體制改革偏向行政改革，並沒有觸及領導人退休制度與國家領導體制。黨政軍各系統的領導人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胡錦濤、朱鎔基和劉華清則是鄧小平在常委會中安排的三顆棋子，分別扮演江澤民接班人、市場經濟建設舵手與輔佐江澤民鞏固軍權的角色。

除了確立改革開放路線不變之外，十四大還發生「楊家將」失勢的重大事件。六四事件之後，楊白冰升任軍委秘書長，逐漸形成以楊尚昆、楊白冰為中心的軍中派系。在1992年鄧小平與陳雲進行經濟路線鬥爭時，楊白冰喊出解放軍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口號，是鄧小平獲勝的重要原因，但也引發鄧小平死後軍人干政的隱憂。十四大結束後，楊尚昆、楊白冰失勢。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以後，江澤民身兼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項職務，確立全面接班的地位。



照片3-3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



## 二、江澤民時期（1990年代初期至2000年代初期）

在1992年至1997年之間，江澤民逐漸擺脫革命元老的牽制，革命元老則因逐漸凋零，退出決策權力中心。1994年9月中共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將「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列為1978年以來「黨的建設」的重大成績，同時江澤民安插親信黃菊、吳邦國、姜春雲進入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正式宣告江澤民時代來臨。1995年4月，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遭到整肅，震攝地方諸侯，至此江澤民的權力已經完全鞏固。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確立鄧小平理論為中共指導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1997年中共十五大出現「70歲劃線離退」先例，除江澤民以外，其餘超過70歲的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全部退休。這個先例突破年齡限制僅適用在省部級以下幹部的侷限，具有歷史意義。

2002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的地位，並進行人事改組。「三個代表」——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2000年2月下旬江澤民赴廣東考察時提出。其後，江澤民加緊建構這個思想體

系，以便確立他在官方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三個代表」修正過去中共只代表工農等被剝削階級利益的情況，改以「生產力」為標準，將當時代表最先進生產力的社會階層——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僱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納入中共代表的範圍。「三個代表」可說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重大變動，不過它也弱化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

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和委員全部低於68歲，僅續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一人例外。由此可見，十五大的劃線離退已成為慣例，並將離退年齡從70歲降為68歲。儘管年齡限制進一步發展，但也看到向權力妥協的痕跡。例如軍委主席仍無年齡或任期限制。在十六大上，江澤民交出總書記職務，並於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將國家主席職務交給胡錦濤。然而，他仿效鄧小平模式，以一介普通黨員身分，續擔軍委主席。卸任總書記仍擔任具有實權的軍委主席，造成新舊任總書記之間存在矛盾猜忌、權力較量的潛在風險。這是十六大權力交替的一大敗筆。

### 三、胡錦濤時期（2000年代初期至2010年代初期）

十六大中共領導班子選出後，外界揣測江澤民將利用「上海幫」在政治局常委會的多數優勢，使得胡錦濤成為「兒皇帝」。胡錦濤上臺後，開始構思本屆領導班子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下簡稱：「和諧社會」），將著力點轉向「均衡發展」。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胡錦濤闡述「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2004年9月，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首次完整說明「和諧社會」。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同時，胡錦濤加快腳步，建立自己的班底，大量

「團派」（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幹部）出任副省部級以上黨政領導職務，特別是省委書記和省長（Kou, 2011: 166-185）。

2004年起，中國大陸經濟出現過熱現象，中共高層在宏觀經濟調控議題上爆發分歧。胡錦濤、溫家寶從同年3月起多次重申宏觀調控的重要性。然而，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並未配合，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甚至在政治局會議中批評國務院的政策。7月以後，雙方分歧移到意識形態與江澤民地位等議題。江澤民以解放軍活動為主軸，加強他在軍中的個人地位，並企圖奪回落入胡錦濤手中的「三個代表」詮釋權。胡錦濤則以鄧小平百歲誕辰紀念為名，將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度。2004年7月28日中央電視臺專訪鄧小平家人，重播鄧小平1989年辭去軍委主席的信件和講話，稱頌他為推動幹部年輕化做出表率。2004年9月中共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由胡錦濤接任。2006年陳良宇遭到調查，成為1995年陳希同之後第二位落馬的政治局委員。

200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七大。胡錦濤續任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會仍維持9人。年滿68歲的政治局委員全數退出崗位，強化領導人屆齡退休的慣例。同時，中共首次在沒有革命元老指定的情況下，在黨員領導幹部會議上透過「民主推薦」的方式挑選習近平、李克強為接班人選。儘管在制度發展上有前述成果，但派系關係仍是幹部晉升的重要關鍵。「團派」人數持續成長，又創新高。高幹子弟（俗稱太子黨）人數眾多，特別是在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的比例更高。總體來看，十七大人事安排顯示集體領導仍會持續。

#### 四、習近平時期（2010年代初期至今）

2012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八大，這一年也是極為不平靜的一年。習近平、李克強等第五代領導人面對的中國大陸是由兩種圖像構成的場景。一方面是經濟實力強大、國際影響力日增，連美國也不得不顧忌三分；另一方面則是貧富差距懸殊、城鄉發展失衡、經濟成長逐漸下滑、幹部腐敗、

環境污染嚴重、新疆西藏等地區屢傳族裔抗爭。中國大陸知識界也因為對上述問題的成因與解決方向看法不同，產生左右之爭。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必須接受嚴苛的挑戰，處理這些複雜的問題。

2012年中共內部發生一連串驚人的政治鬥爭。2月重慶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逃往成都美國總領事館，揭起不平靜的序幕。3月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妻子古開來涉嫌殺人，被停職徹查。同月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的獨子令谷車禍身亡，多家國際媒體做出了政治謀殺、車上性行為等臆測。

在國際上，2012年對中共高層也是多事之秋。中共面對美國日益增強的壓力，如2012年1月美國正式宣布「亞太再平衡」的新策略。4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要集資購買釣魚臺島嶼，引發日中釣魚臺衝突急遽升高。同月菲中黃岩島事件爆發，雙方軍警船隻對峙，之後中共實際控制黃岩島。6月越南國會通過《越南海洋法》，宣示其在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主權，中共則成立三沙市作為反擊。

在這種多重挑戰的壓力下，習近平上臺後隨即開始集中權力。集中權力的措施除了前面提到的變革黨國體制（最高領導人個人集權、黨委擴權）以外，還包括大規模且持續的反貪整肅與人事調動。習近平藉由反腐運動一方面清除政敵與特權貪腐集團，另一方面則藉機拔擢舊部親信。2012年12月5日前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因涉嫌違紀被中紀委調查，成為十八大後首位被調查的省部級官員。2013年3月前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遭到調查、2014年6月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遭到調查、2014年12月已從中央辦公廳主任改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令計劃遭到調查、2015年4月另一位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遭到調查。2012年11月至2021年3月，高達383位現任或退休副部級以上幹部與副軍級以上軍官，因貪腐或違紀而受到處分。<sup>1</sup>落馬高官包含周永康、蘇榮、令計劃、徐才厚、郭

<sup>1</sup> 關於十八大以後因貪腐或違紀落馬的副部級以上幹部與副軍級以上軍官名單，見維基百科（2021）。

伯雄、孫政才、張陽、房鋒輝等副國級領導人，以及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等3位正大軍區級將領。54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落馬，人數比中共1949年建政至2012年的總數還要多（35位）。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前的三個月，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落馬。孫政才原本被外界看好有可能和胡春華（時任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現任國務院副總理）成爲中共第六代領導班子的核心成員，他的落馬引起外界議論梯隊接班可能不再存在。

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孫政才等人形成的政治野心集團牽扯出複雜官商勾結與政治圖謀，直接威脅習近平的統治地位。習近平和中共官方文件也曾多次嚴厲指責周永康等人分裂黨的政治野心與陰謀。基於此，習近平自然採取整肅黨內政敵的對策，同時負面評價集體領導。

十八大以來重大省部級人事調動具有打破年齡優勢、問責範圍擴大、內舉不避親、調動速度快等特徵。多數均在兩年內快速從副部級晉升至正部級，不合格者也快速離任，因此習近平能迅速在黨政機關中安插自己的人馬。習近平特別偏好跟他具有共同經驗的幹部，如曾經和習近平在同省工作（河北、福建、浙江、上海）或家鄉地緣（陝西），曾經在清華大學任教或就學，具有下鄉知青背景，或是曾經擔任縣委書記工作經歷等（Wu, 2019）。在十九大後，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等分由丁薛祥、陳希、黃坤明等習近平嫡系主掌。重要省市中，除了蔡奇、陳敏爾留任北京、重慶一把手外，新任廣東省委書記李希、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皆與習有深厚淵源。習近平也對軍方實施同樣的打貪與人事調整做法。<sup>2</sup>

<sup>2</sup> 關於軍方將領的密集調動，參見Kou（2017: 866-885）。

## 肆、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研究途徑

### 一、派系政治

1980年代以後，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主要有四種。首先，是派系政治途徑。這些文獻指出，中共高層缺乏權力競爭的遊戲規則，政治繼承往往成爲派系間的零和遊戲，不但造成欽定接班人接掌權力的困難，也導致政局不穩定。學者對於派系的定義、派系的形成，以及派系鬥爭結果等三大議題上出現許多辯論，充實了相關文獻。

在派系定義上，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爲派系以「扈從關係」（clientelist ties）爲基礎。它是一種以領導人爲核心輻射出去的人際網路，成員間具有位階高低的垂直特性（Nathan, 1973: 42-44）。不過，華裔留美學界鄒讜（Tang Tsou）認爲「非正式團體」（informal groups）或「政治行動團體」（political action groups）較爲恰當。構成派系的關係網絡不僅有高低位階的扈從關係，也有同儕間的關係（Tsou, 1976: 100; 1995: 97, 131）。羅德明（Lowell Dittmer）更以「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取代「派系政治」。他認爲若將派系侷限在垂直特性的關係網絡上，會排除同鄉、同事、校友、家族等等關係（Dittmer, 1995: 12）。這些非正式關係並不真的具有垂直特性，而是彼此平等的關係。

學者對於派系政治的成因也有不同看法。學者大致從權力鬥爭、政策歧見、官僚組織利益三個角度解釋派系政治的出現。權力鬥爭模式認爲，派系源自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因此，權力分配是派系鬥爭的關鍵，政策分歧僅爲政爭的工具。政策歧見模式認爲，派系的出現與領導人的路線衝突有關。有些學者認爲派系政治是以政策路線鬥爭爲主，權力爭奪爲輔，或者兩者同等重要（Tsou, 1976: 110-111; 1995: 114, 119）。官僚組織利益模式根據西方官僚政治的觀點，認爲派系衝突固然與權力鬥爭、政策分歧有關，但官僚系統的利益衝突也扮演重要角色。在這種情形下，仕途路徑成爲派系結盟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後，學者對於派系鬥爭結果的看法也不一致。黎安友認為中共菁英政治存在著某種禮節（code of civility），派系鬥爭是非零和遊戲（Nathan, 1973: 46）。鄒讜則認為派系政治是「勝者全拿」的零和遊戲，鬥爭結果始終是一個派系（或派系聯盟）徹底打敗或消滅另一派系（或派系聯盟）（Tsou, 1995: 97）。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也認同「勝者全拿」的鬥爭本質。他認為派系政治雖然不乏議價妥協的現象，但爭奪「領導核心」的鬥爭必定是一派壓倒另一派的完全勝利，同時造成政策的劇烈變動（Fewsmith, 1994: 8-10）。

## 二、世代政治

部分學者從世代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共菁英政治，提供另一種視野。世代政治途徑和派系政治途徑都是沿襲菁英衝突的脈絡，但觀察的角度不同。派系政治的基礎是扈從關係，討論不同關係網絡群體間的衝突。世代政治的基礎則是共同經驗，同一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具有相近價值觀與政治傾向，進而探討不同世代間的政治衝突。

由於每一個世代政治菁英經歷的重大事件都不同，形成獨特的共同記憶，導致世代間的集體差異。研究世代政治的學者認為，革命建國世代與下一個世代間的權力轉移最容易發生衝突。共黨國家領袖可以分成英雄型領導者（heroic leadership）和官僚管理型領導者（bureaucratic leadership）（Meyer, 1983: 165-169）。前者是政權締造者，具有革命建國或推動現代化的貢獻；後者是政權的維護者，以解決問題、專業管理能力取勝。官僚管理型領袖多半缺乏豐功偉業，同時受到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注重專業、科技等現實發展的需求。這些特性與英雄型領袖重視社會主義教條理論、革命建國功績的特性不同。

隨著革命元老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陸續過世，老人政治的影響已經減弱，世代政治途徑的解釋力降低。不過，隨著習近平大量利用毛澤東時代的治理手段，達成現代化目標的現象愈來愈明顯，文革世代集體記憶的重

要性再度增加，世代政治的視野仍有其時代意義。

### 三、技術專家治國

從1980年代中期起，開始有人運用「技術專家治國」的觀點分析中共菁英政治。這個研究途徑與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息息相關。1978年中共決定改革開放後，急需大量專業幹部推動發展。在這個政策下，中共中委會的結構從1982年十二大起出現以技術專家取代革命老幹部的趨勢（Lee, 1983: 674）。此途徑認為新一代菁英多半為技術官僚與管理者出身，具有工業技術教育、專業經驗與重要職位等三個特性（Li and White, 1998: 231; Li, 2000: 19-21）。相較於老幹部，技術官僚出身的政治菁英具有科技民族主義的思想（techno-nationalism），更重視科學技術，也更支持改革開放的路線。

學者間曾辯論中共菁英政治是否純粹為「技術專家治國」。有人認為技術官僚出身的政治菁英已經掌握中共決策中心（Li and White, 1998; Li, 2000）。有人則認為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應該是「政治—技術專家治國」（political-technocracy），並非單純的專家治國，而是由黨務與政府行政官僚（如組織、宣傳、統戰等部門出身的幹部）、技術官僚共同治理（Zang, 2004: 165-170）。寇健文（2007：1-28）研究副部級以上歐美海歸高官、財經高官政治流動後，間接支持後者觀點。他發現，中共提拔不少留學歐美的人才，但他們大量集中在財經、科技、管理、教育等技術部門，幾乎都沒有在組織、宣傳、統戰、紀檢等傳統黨務部門工作的經歷。

### 四、制度化

隨著革命元老逐漸凋零，自本世紀初起，強調結構制約行為者的制度因素成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新議題，與原有強調行為者的研究途徑（派系政治、世代政治與技術專家治國）並存於文獻。許多鄧小平時代開



始的制度改革，如幹部任期制與退休制，都在江澤民時代確立了發展方向（Dittmer, 2001: 58）。中共高層運作的制度化展現在兩方面：第一，決策過程必須經過諮詢機構和不同決策者的共同研議。第二，1990年代後期退休制度已經落實在高層幹部身上，已經沒有老人政治與永遠的領袖。高層政治不再是零和遊戲，權力也不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整個制度（Shambaugh, 2001: 104-107）。過度強調權力鬥爭的分析方式忽略繼承政治制度化的趨勢，包括年滿70歲（後來降為68歲）的領導人必須退出黨政領導職務，以及國家主席、總理兩任十年的任期限制。雖然制度化尚未完成，但制度化確實是發展中的趨勢（Teiwes, 2000: 71-95）。相關文獻討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的制度化時，聚焦在領導人年齡限制、任期限制、梯隊接班、逐級晉升、集體領導等，降低了「人治」色彩（寇健文，2010）。在2002年十六大結束之後，學界普遍認為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已經提升，應該將派系鬥爭放在制度化的框架下討論。

## 五、習近平時代對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啟示

如同第二節所述，習近平上臺前後中共黨國體制的兩大主要差異是：從集體領導到個人領導、從黨政分開到黨委擴權。鄧小平時代開啟的政治體制改革，包括集體領導、黨政分開、機構精簡可說是反省文革時代的體制弊端，並配合他與華國鋒鬥爭時的政治需要，因而產生的改革方向。若是如此，什麼因素造成原有改革方向在習近平時代出現轉變？這個問題涉及制度化是否會逆轉，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會出現逆轉。簡單來說，制度化是一個可逆轉的過程。若職務權力型領導人在位期間建立等同革命功勳的重大功績，獲得堅實的個人權威，而他又有野心突破現有領導人新老交替和集體領導的規範，制度化就會出現逆轉（寇健文，2010：90-91）。因此，要解釋當今的集權現象，就需要瞭解習近平的政治企圖和他所處的外在環境。因此，研究中共菁英政治必須同時考量中共面對的國內外環境挑戰、黨內政治生態變化與領導人政治性格，缺少任何一類因素就不能完整

解釋習近平時代出現的變遷。換言之，既要考慮結構對人的影響，也要考慮特定時空下，人的特殊價值觀與選擇偏好。

2012年習近平上臺前後，中共面臨的國內外環境與2002年胡錦濤剛上臺時面臨的環境已有很大的差異，形成需要強勢領導人克服挑戰的社會期待氛圍（Kou, 2019）。國內外環境壓力至少包括：（一）是否能找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繼續維持中速以上經濟成長；（二）是否能緩和社會不平等造成的貧富矛盾，抑制「仇官」、「仇富」的激進情緒與知識分子的左右之爭，維持政權合法性；（三）是否能抑制西藏、新疆等地的族裔騷動，緩和族裔問題激進化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四）在中國崛起之後，是否能找出美中兩大國和平相處之道，以及維持東亞周邊外交環境穩定，防止出現美國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家聯手圍堵中國的局勢。這些國內外環境挑戰在胡錦濤就任時都沒有那麼嚴重，但到了習近平上臺前已經成爲中國大陸無法迴避的重要挑戰，形塑出需要強勢領導人解決問題的期待氛圍。

此外，習近平上臺前後，經歷周永康、令計劃等黨內政治野心集團的奪權陰謀，江澤民、胡錦濤等老人干政程度相對弱化，黨內權力格局也出現空檔。原來支撐集體領導的多頭馬車格局遭到破壞，黨內制約習近平擴權的力量減弱。

最後，習近平的政治性格與認知，諸如衝突是政治本質的認知、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對友和，對敵狠」的人際觀、堅持原則不吃硬的處事性格、民族偉大復興與完成革命事業的歷史使命等，讓習近平借用這種國內外氛圍與黨內權力空虛，重塑黨國體制。

**關鍵詞：**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黨國體制、集體領導、派系政治、習近平集權

## 延伸閱讀

1. Lampton, David M. 著，林添貴譯，2015，《從鄧小平到習近平》，臺北：遠流。譯自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2014.
2. Pei, Min-xin. 著，梁文傑譯，2017，《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臺北：八旗文化。譯自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2016.
3. 峰村健司著，蘆荻譯，2016，《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習近平掌權之路》，臺北：聯經。譯自《十三億分の一の男 中国皇帝を巡る人類最大の権力闘争》，2015。
4.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修訂三版），臺北：五南。
5. 景躍進、陳明明、肖濱主編，蔡文軒審閱，2018，《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

## 思考問題

1. 1978年至2012年之間，中共在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上逐漸走向制度化，但蘇聯或東歐共黨政權沒有出現類似的發展趨勢。請比較中國大陸與蘇東之間，出現發展差異的可能原因？
2. 2012年習近平上臺後，中共黨國體制走向最高領導人集權和黨委擴權，一反過去走向集體領導與新老交替制度化的趨勢。造成習近平集權的原因為何？集權體制可以持續嗎？有何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3. 從上述提到的幾個研究途徑來看，其多為西方移植而來的政治視野。是否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侷限？這些途徑是否能適切的解釋中共菁英政治的發展？
4. 習近平為何要設置國家監察委員會？能有效處理幹部腐敗違紀的問題

嗎？外部監督與內部監督在本質上有何差異？對於反貪的效果有何影響或侷限？

5. 習近平上臺後持續整肅政敵，打擊貪官，拔擢親信，其程度遠高於江澤民和胡錦濤在位時。他為何需要這樣做？被拔擢的親信有哪些背景特徵？會對中共菁英政治造成什麼影響？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BBC News中文網，2018，〈學者稱中國機構改革回歸「黨政合一」、國務院權力被削〉，<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484361>，查閱時間：2019/12/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1987，《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林生，2005，《中國地方政府決策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

共產黨員網，2015，〈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0年2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http://news.12371.cn/2015/03/11/ARTI1426059362559711.shtml>，查閱時間：2019/12/19。

共產黨員網，2017，〈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http://www.12371.cn/2017/10/24/ARTI1508832982612968.shtml>，查閱時間：2019/12/19。

多維新聞網，2019，〈中共開打意識形態保衛戰 習近平力補國家權力四大短板〉，[http://news.dwnnews.com/china/big5/news/2019-03-22/60124988\\_all.html](http://news.dwnnews.com/china/big5/news/2019-03-22/60124988_all.html)，查閱時間：2019/12/19。

阿波羅新聞網，2014，〈國安會上涉江澤民架空胡錦濤信息被公開〉，<https://www.aboluowang.com/2014/0503/393492.html>，查閱時間：

2019/12/19。

俞可平，2001，《中國政治體制》，臺北：風雲論壇。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十三大後的黨政分開改革〉，<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930/cc30wuwei31/zh-hant/>，查閱時間：2019/12/19。

寇健文，2007，〈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50（3）：1-28。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修訂三版），臺北：五南。

寇健文、蔡文軒，2012，《瞄準十八大》，臺北：五南。

康曉光、韓恆，2005，〈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社會學研究》，（6）：73-89。

張天榮主編，1991，《黨的建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與實踐》，湖南：湖南出版社。

張文正、馮秋婷主編，1990，《黨的領導概論》（第二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維基百科，2019，〈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查閱時間：2019/12/19。

鄧小平，1994，〈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謝慶奎主編，1991，《當代中國政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美國之音，2018，〈中共塞「習思想」入憲，更顯兩會橡皮圖章本色〉，<https://www.voachinese.com/a/xi-thoughts-enshrines-constitution-20180119/4216362.html>，查閱時間：2019/12/19。

## 二、英文

Asianews.it. 2007. "A Real Battle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 Local Authorities.” <http://www.asianews.it/news-en/A-real-battle-between-the-National-Government-and-local-authorities-9835.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19, 2019).
- Dittmer, Lowell. 1995.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1-34.
- Dittmer, Lowell. 2001.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45: 53-67.
- Fewsmith, Joseph. 1994.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E. Sharpe.
- Kou, Chien-wen. 2011. “Elite Recruitment and the Duality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The Mobility of Western-educated Returnee Elites in China, 1978-2008.” In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166-185, eds. S. Philip Hsu,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ou, Chien-wen. 2017.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CP-PL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232: 866-885.
- Kou, Chien-wen. 2019.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Xi Jinping Era: Trends, Causes and Impa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es 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Xi Jinping Er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Lee, Hong-yung. 1983. “China’s 12th Central Committee: Rehabilitated Cadres and Technocrats.” *Asian Survey* 23 (6): 673-691.
-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1998.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38 (3): 231-264.
- Li, Cheng. 2000.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161: 1-40.

- Meyer, Alfred G. 1983. "Communism and Leade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6 (3): 161-169.
- Nathan, Andrew. 1973.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53: 33-66.
- Shambaugh, David. 2001.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45: 101-111.
- Teiwes, Frederick C. 2000. "The Problematic Quest for Stability: Reflections on Success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Governability, and Legitimacy in Post-Deng China." In *China Under Jiang Zemin: 71-95*, eds.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Tsou, Tang. 1976.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65: 98-117.
- Tsou, Tang. 1995.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34: 95-156.
- Wu, Guo-guang. 2019. "The King's Men and Others: Emerging Political Elites under Xi Jinping." <https://www.prcleader.org/wusummer>. (Accessed on December 19, 2019).
- Zang, Xiao-wei. 2004.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New York, NY: Routledge.